



中 国 新 农 村 启 示 录



| 冷梦 著
| 太白文艺出版社

高西沟调查

——中国新农村 启示录

冷梦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西沟调查：中国新农村启示录/冷梦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12

ISBN 7-80680-428-5

I . 高... II . 冷... III . 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2431 号

高西沟调查

著 者 冷梦

责任编辑 韩霁虹

封面设计 可峰

内文设计 豆豆

出 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社长兼总编：李丽玮

发 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省印刷技校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插 页 3

字 数 359 千字

印 张 20.2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80-428-5/I·31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 可寄印厂质量科对换

邮编：710077



冷梦，女，本名李淑珍。1982年毕业于大学中文系。1973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文学。至今已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视剧、文学剧本、美学论文论著共计四百余万字。主要作品《百战将星·肖永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黄河大移民》（《中国作家》）、《天国葬礼》（上、下两部，群众出版社）、《特别谋案》（群众出版社）、《沧海风流》（四川文艺出版社）、《陕西四才女·冷梦》（陕西旅游出版社）。作品荣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届图书奖，西安首届女作家奖，陕西省第五届文学奖及美学理论研究论文、论著奖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三五人才”，享受中青年专家政府津贴。陕西高级专家协会成员。

一个不可回避的严峻现实，人们在谋求经济利益时，正在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人类造成的灾难，还得靠人类自己来解决。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褶皱里，隐藏着这样一个村庄。面对它，你必须沉思或者反思。也许太迟，也许正是时候！

——作者手记

目录

上部 谜一样的村庄

第一章

活着并且要记住：一个中国人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年头 3

第二章

高西沟浮出水面：人民日报记者发现新大陆 11

第三章

中国的 1958：激情燃烧的岁月 18

第四章

挑战大寨模式：高西沟模式“三三制” 43

中部 贫穷中的富裕

第五章

“红旗”浸透的血泪：只要你听了我的歌 57

第六章

彷徨中的坚持：你的名字叫“坚韧” 107

下部 合不上の大书

第七章

陕军作家和高西沟：一个被遗忘的村庄 155

第八章

特别的榆林特别的书记：重新发现的价值 189

第九章

中国新农村启示录：高西沟 2000~2005 年 223

第十章

高西沟典籍与释义：大寨·大邱庄·华西村及其他 276

尾声

但愿从此记住 299

后记

感恩农民 冷梦 305

上部 谜一样的村庄

第一章

活着并且要记住： 一个中国人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年头

1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那一天，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到了一个叫“奥斯维辛”的地方，它是波兰的一个小镇。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在原先焚尸炉高高烟囱的周围，巨大的火炬在熊熊燃烧……洁白的冰雪世界中，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和各国政要面色肃穆苍凉，仿佛在为几百万逝去的亡灵追问着一些永恒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是今天的人类还无法做出回答的。那一刻，我的眼睛里浸满了泪水。我在想，集中营或许对我们非常遥远，但人类只要有记忆，记忆中就会永铸下一些抹不去的场景：那些刻骨铭心的欢愉，或者，苦难……

苦难记忆，是人类最深刻的记忆。

我知道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女大学生私自印制了一些饭票，这件事让校方发现了，因为她总是能吃比别人多的杂面窝窝头，在别人挨饿的时候，她没有挨饿。校方找她谈话，一次，两次。让她写检查，一次，两次。后来一天，年轻姑娘从高高的教学楼上纵身跳了下去，用青春的躯体亲吻了灰冷的水泥地面。饥饿结束了，与饥饿同时结束的还有十八九岁的花样年华。

这是中国的1961。



60年代高西沟部分梯田

1960年，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在山西高原的高西沟村，人们在陡峭的山地上开垦出一片片梯田，努力维持生计。然而，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饥荒仍然无情地吞噬着生命。这一年，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导致了大面积的饿殍。在山西，高西沟的村民虽然通过辛勤劳动改善了生存条件，但依然无法逃脱饥荒的魔爪。在山西的另一个角落，太原市也在这一年遭受了严重的饥荒。在太原的广济街巷，回汉杂居的居民们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每天清晨，都能听到“积极妈妈”——一位年迈的回族老太太，用嘶哑的声音吆喝着：“萝卜来了！快去称萝卜！”

在古城西安，离市中心钟楼不远的地方有条街巷，叫广济街，这是一条回汉杂居的街巷。每天清晨，街道居委会主任，人称“积极妈妈”的老太太拐着双伶仃小脚从街头走到巷尾，用喑哑的嗓子喊着：萝卜来了！快去称萝卜！

萝卜是些糠心萝卜。但萝卜这时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是救人命的关键食品，能吃上供给市民的萝卜，那是需要有特殊的关系。回汉杂居的现实，让这条街巷的萝卜大都“分配”给了有优先权的少数民族回民。在连萝卜都吃不上的日子里，一个饥饿的小女孩躺在床上，母亲用浮肿的手抚摸着她黄瘦的小脸。她老家的大伯大娘都已经饿死了，小女孩也奄奄待毙。饥饿在这座大城市里迅速蔓延。母亲对她说，要想活命，得把她送人，送给楼上一家人家。小女孩铅一样重浊的泪水滚落在母亲浮肿的手上，她用微如游丝的小嗓子说，她就是饿死，也要死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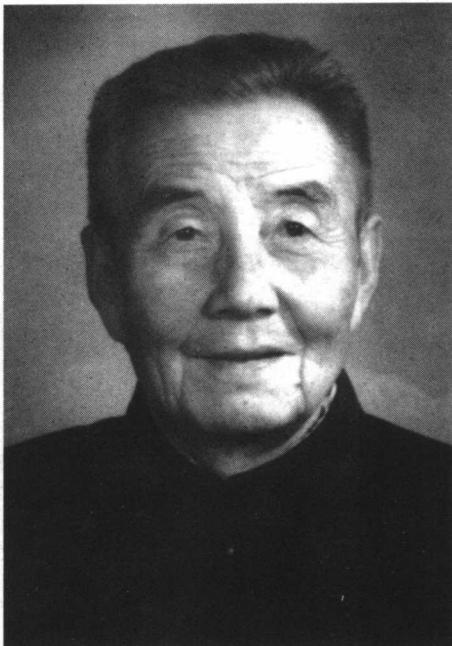
自己家里。许多年以后，长大的小女孩成了位作家，那时，她托人到了老家，给坟头上只有一棵枸桃树的饿死的一对孤寡老人祭奠了几杯薄酒……

这个小女孩，其实就是当年的我。

2

也是在这一年，1961年。

从省城西安出发的一行人风尘仆仆地到了离西安一千多里之遥的陕北一个小村庄：榆林地区米脂县高西沟。带队的是一个瘦瘦高高、长着长方形国字脸的老干部，他就是前国务院副秘书长、时任陕西省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的常



晚年的常黎夫

黎夫。这支由常黎夫和时任陕西省委办公厅主任杜鲁公带队的工作组到高西沟来的使命,是要在这个当时还叫做“高庙山公社高西沟大队”的村子调研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简称“六十条”。我们不去说“六十条”所形成的后来统治了中国几十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的功过是非,单说常黎夫等一行人到了高西沟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刚刚离开大城市西安满街菜色、颜面浮肿的人群,常秘书长在高西沟见到的却似乎是另外一番景象。村口欢迎他的村民不说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但至少身板结实,健健康康,精精神神。大姑娘小媳妇、老汉老婆,包括满地跑的孩子没有一个看上去面黄肌瘦和一副饥饿所造成的羸弱样子。乡亲们显得欢天喜地。那是只有“丰衣足食”才能带给人们的不需伪装的幸福与欢乐的模样,只有肚子里有着足够的食物才能有的喜庆模样。虽然没有十足陕北风情的唢呐和秧歌,工作组一行十几人还是被欢乐的村民热情洋溢地迎进了他们村,住进了高西沟大队队部几孔不错的窑洞里。

次日清晨,山谷间岚气氤氲,在和煦的春风里,工作组成员像撩开新娘娇羞的面纱一样,在缥缈的淡色青晕里第一次瞥见了这个小山村的真容。谷子高粱、大豆小豆,农作物苗儿青青,苗苗壮壮层层叠翠地铺展在他们目力所及的沟沟壑壑。近看,株株行距纹丝不乱,不像是人撒种种在地里,倒像是巧媳妇一

针一线描画在绣匾上。好庄稼！没有谁会怀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高西沟又会是一个丰收年。

3

而且，和他们看到的赤目千里、顶着光秃秃黄盖帽儿的黄土高原其他村庄不一样，高西沟山上有树，坡上有草，还稀罕地有着绿汪汪的葡萄藤，开着粉嘟嘟小花儿的苹果树。羊群白云飘落山间一般在唱着信天游的拦羊汉高亢的歌声里满坡撒欢，间或有驴子“咴咴”的叫声，有老牛“哞哞”的低沉的吼声……

高西沟给人的感觉不像是真实的。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工作组成员会以为是谁编出来的童话世界。

常秘书长是带着药罐子下乡的，随身带的一个护士每天为他在窑洞里煎几服苦涩的汤药。同时，他还属于“肉蛋干部”，每天可以吃上一枚专门配给给他的鸡蛋。除了中药和鸡蛋，常黎夫在物质享受方面和其他工作组成员没有什么两样，大家一锅里吃饭，一炕上睡觉。关于这一段工作组住在高西沟前后 40 多天的生活情景，有两个关键性的人物我不得不说。

第一个人物是高祖玉。当年高西沟大队的大队长，也是高西沟村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这年高祖玉 32 岁，个儿不高，不像陕北那些壮实的后生有着一副粗糙的黧黑面庞和粗眉大眼，刚过而立之年的高祖玉显得眉清目秀，并且一望可知是个精明强干和聪明过人的村干部。也许因为自信，高祖玉举手投足间有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傲气和倔气。这是一个在这个方圆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够让人不折不扣、坚决地贯彻他的意志，一言九鼎的人物。许多年以后，已经成为一个耄耋老人的高祖玉坐在他家的窑洞里，满脸笑容地给我“话说当年”——

1961 年春，常黎夫率省委工作组调研“六十条”贯彻执行情况，实际调查阶级分化。调查内容包括粮食产量、一般平均亩产、坡地和坝地平均亩产、人均收入等各项指标情况。调查组由西北局农工部长、陕西省农工部长、省委办公厅主任等组成。当时规定，上边来人由所在村队供给每人每天半斤洋芋（自己掏钱买），队里统一起灶，派人做饭。调查组在高西沟住下后没几天，发现村上群众比他们吃得好。这个村的群众居然能吃上窝窝头！省上干部很惊讶，就跟我商量：能不能卖给他们每人每天一斤洋芋。我让村民把细糠、黄豆、谷子磨点给省上干部蒸了些杂粮窝头，一人吃上两个。后来，就干脆用了个大布袋，把粮食、洋芋装来，窝窝头、洋芋随便吃。到了秋收，调查组又来村上验收。高西沟春天报的所有



第一任支部书记高祖玉
当年的英姿

计划和各项指标都出色完成并且超标。西北局农工部长、省农工部长极其兴奋，回去后把高西沟的情况给《陕西日报》一说，很快《陕西日报》来了，接着，《人民日报》也来了。

——这大约就是高祖玉讲给我听的“高西沟发现记”。

4

第二个人物叫林关石。

林关石原本不叫林关石而是叫林逢和。1935年出生于浙江乐清县一个富裕

农民的家里，1953年从浙江台州农校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富农”而被带有“劳动改造”性质地从江南鱼米之乡抛到了满眼黄尘的陕北黄土高原，当了个乡农技站的农业技术员。瘦小的浙江小伙儿内心里有着一股犟劲儿，不服命运对他的抛弃，特别改名以言志，“关石”意思是要做一块边关的石头，扎根在边关的这片黄泥土中。林关石后来被人称作中国水平梯田的“鼻祖”（关于这一点我后面还要讲到）。1959年农历正月十五，春节刚过，他带着铺盖卷被乡党委书记派到了高西沟蹲点，这一蹲，日历就翻过了三年。因此，1961年春天常黎夫等人到高西沟的时候，驻队干部、年轻的乡技术员林关石也自然而然成为了工作组的一员。

同高祖玉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民不同，也同常黎夫、杜鲁公等从省城下来的高官不同，林关石当时过着小县城里一般城镇居民的生活。他家在米脂县城。据他讲，在后来被官方用经典的语言经典地称作“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的年月里，一个干部的月工资只能买到两筐洋芋（折合100斤左右），或者，24斤粗粮，这些粗粮包括玉米、高粱。如果想吃上当年毛主席、党中央在陕北时养育了中国革命的小米——林关石所在的榆林地区米脂县，正是以其米如脂而闻名的“小米之乡”——对林关石这样的一般干部，此时如同珍馐玉馔般难能到口，一天人均大约30克，尚不足一两。那是个需要数米粒吃过日子的年月。驻队干部和工作组成员林关石在常黎夫到来之前和以后，大家住在队部的窑洞里，在一口大锅里搅勺把的那些日子里，他感觉他过着共产主义天堂般的生活，因为他居然能够每天幸福地吃上小米干饭和用白面、高粱面、洋芋粉拌在一起蒸的洋芋丸子！而更加了不起的，是高西沟大队当时对驻队干部和工作组的特殊优待，每过几天，队上的灶都会给他们改善伙食，吃一顿白面条或者揪面片。

如此说来，省委工作组的人在高西沟就不仅吃得饱而且还吃得好。



林关石近照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林关石终生难忘。

当他在高西沟过着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的日子里，在米脂县城，他的妻儿却在“瓜菜代”，过着忍饥挨饿的苦日子。不用说，林关石餐餐吃饭，端起碗碗里就映现出他的妻儿面黄肌瘦、嗷嗷待哺的可怜模样。这天，林关石端着饭碗又在暗自难过，结果被管灶的副大队长高万贵发现了，等他那天回到窑洞，趁着没人，高万贵偷偷地从衣服底下摸出个小口袋，里面装着两三斤白面！林关石想也没想，含着眼泪接受了这几斤白面，连夜翻山越岭送回了家……

这件事，他和高万贵都认为做得是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在工作组后期总结的时候，却还是被人揭发了出来。大家严辞厉色地批评他，说他阶级斗争观念模糊，这属于多吃多占。在那个年月里既然什么都要和阶级斗争扯上关系，林关石也就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和这些国家民族大义、虚无缥缈的阶级斗争哲学相比，能让饥饿的妻儿黄瘦的脸上浮上难得的笑靥，能让她们的饥肠里吃进去些许白面，他觉得男儿大丈夫何需悔恨！

林关石说，他当时态度诚恳地做了“检讨”。而这之后不久，他也结束了在高西沟的驻队生活。

5

常黎夫他们在高西沟一住 46 天。

在全国普遍饥馑的大灾年里，他们看到高西沟人居然过着还比较“丰衣足食”的日子，没有人挨饿，绝大多数人都能吃饱肚子。农民日常的饮食虽然不及他们，吃不上白面，但土豆、小米，还有大豆、绿豆和黑豆磨的陕北人爱吃的“钱钱饭”倒也顿顿能填饱肚子。每当黄昏，夕阳西下，沟沟岔岔的土窑洞里家家炊烟袅袅，这让常黎夫他们不由想到全国乃至陕西的许多农村饿殍遍野的情景；他们知道，就在他们刚刚离去的西安城中，数以百万计的西安市民正苦苦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当然，其中包括我、我们一家人和我们院子里的邻居……

我想，常黎夫他们肯定对高西沟印象深刻。

我想，常黎夫也一定正如高祖玉说的，把他们发现的神奇的黄土地的褶皱里隐藏着的这样一个村庄报告给了新闻界。

第二章

高西沟浮出水面： 人民日报记者发现新大陆

1

其实，除了陕西省委工作组和常黎夫他们，还有一个原因。

这年更晚一些时候，1961年11月，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米脂县作为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十几个县之一，是历来“污染”黄河的重灾区县，也历来要在大会上作重点发言。米脂县委书记在他的发言中重点介绍了他们县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村庄高西沟，介绍他们水土保持的经验和农林牧综合治理的经验。与会的新闻记者立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在会议刚刚结束不久，是年冬天，在北京朔风凛冽的严寒中，在陕北黄土高原北风呼啸雪花飞舞的冰天雪地里，走来了两个中年记者：人民日报社的刘野和王安。

陪同两位记者采访的除了乡农技员林关石，还有陕西省及米脂县水保局的几位水利专家。6个人组成一个小团队，也仍旧吃住在高西沟大队队部。此时高西沟果不其然地在1961年又有了一个丰收年。比起年初常黎夫他们，高西沟人对北京来的记者生活上又有了更多的优待。应当说，直到1961年这年的岁末，全国范围里的大饥馑还没有完全解除，在米脂县城里，一个烧饼一块钱，月工资三四十元的人，也就相当于月收入能买三四十个烧饼。而高西沟人的生活这时却更上一层楼，他们已经有能力让记者们除了吃小米干饭、白面馍，还能隔三岔五地改善生活，吃到香喷喷的炒鸡蛋和羊肉炖粉条，这对久不见荤腥的城里人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诱